

# 她者的眼光——兩本女性主義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作

● 沈 睿

文棣的《現代中國的女性與寫作》探討「新女性」和「新寫作」這兩個現代觀念的出現怎樣預設了女性寫作的位置，又怎樣在當時的中國文化建構和論爭中規範了女性寫作的可能；對現代中國女性文學的理論論爭、寫作發展、政治與寫作的關係都有清晰的闡述。



Wendy Larson, *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近十年來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以女性主義的批評方法對中國文學閱讀與重新閱讀的努力，有了顯著的成果，每年都有數種專著和合集出版。1998年，文棣 (Wendy Larson) 和夏麗 (Sally Taylor Lieberman) 分別出版了新著《現代中國的女性與寫作》和《母親與現代中國的



Sally Taylor Lieberman, *The Mother and Narrative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敘事政治》。她們從不同角度、用女性主義批評理論解讀中國現代文學，分別以女作家與寫作的關係和以母親形象為軸，重新書寫了現代中國文學史。

文棣的《現代中國的女性與寫作》探討了中國現代文學中女性與寫作的關係，以及現代中國女性寫作

的意義。五四時代中國文學的發展是以一批女作家史無前例地出現在寫作領域為標誌的。文棣探討「新女性」和「新寫作」這兩個現代觀念的出現怎樣預設了女性寫作的位置，又怎樣在當時的中國文化建構和論爭中規範了女性寫作的可能。她具體考察了女作家的文化、寫作位置，論述她們怎樣在政治文化的圍限中，既與文化規範妥協，又與之抗爭；既通過寫作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對新舊規範進行明裏暗中的顛覆，又不得不在特殊的文化政治壓力下修改和最終放棄了女性的主體寫作的過程。雖然文棣在〈序言〉中宣稱，此書不是對現代中國女性文學的全面研究，但這本書從女性和寫作的角度，對五四以來到40年代的女性和文學、女性和寫作的關係進行了歷史梳理，對現代中國女性文學的理論論爭、寫作發展、政治與寫作的關係都有清晰的描述和獨樹一幟的闡述。

文棣認為，「女性解放」是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指標。在世界各地的現代化進程中，女性都曾被用來指稱現代化的程度。女性被看成是民族健康和力量的晴雨表。中國亦不例外。中國現代作家和批評家，正是在女性解放這個現代性標誌的範域內討論和分析婦女問題和文學問題的。同時，由於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現代中國女性的寫作與傳統的中國歷史文化有密切聯繫。這種深刻的聯繫對現代女性寫作有根本的制約。

文棣論述說，中國的文化、歷史，特別是儒道兩家的思想體系，都具體規定了女性的社會位置。「女子無才便是德」就是這種規定的體現，其所隱含的是「德」與「才」的互不相容和排斥，所標誌的是「德」

「才」分屬於男女兩性不同的本體性範疇。「德」屬於女性的範疇，代表了自我犧牲的身體折磨；「才」屬於男性範疇，標誌了超逾感情的智力知識和接近文化及文學的能力。「德」是女性的身體實踐，「才」是男性的頭腦領域。文棣認為，五四以來的女性文學正是在這樣的「德」「才」對立的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和西方經濟文化衝擊中國的背景下產生的。她論證，無論新女性文學是何等的新，或提倡得何等的新，實際上新女性作家和新文學的關係是強大的傳統的繼續或變體。當然，這個繼續或變體——五四新女性文學——有其獨一無二的特性。與以往的現代文學史研究不同的是，文棣堅持考察現代文學和傳統文化之間深刻而隱含的聯繫。

圍繞着這個論點出發，《現代中國的女性與寫作》共有五章，分別論證女性與寫作的關係，女性寫作與歷史及當時的政治社會的關係，以及新女性文學的特性。文棣指出，在二十世紀初左右的中國，具有改革精神的知識份子為尋求民族富強的夢想，從而想像出一個不同的中國社會。這種對中國的想像，主要來源於想像中的全球平等，一個中國可以在語言上、文化上平等參與的世界大同景象。婦女首當其衝地成為本世紀初知識界爭論最火熱的論題之一。許多知識份子如康有為、梁啟超等都相信，中國婦女的生存狀態就是中國缺乏力量和落後的象徵。因此，婦女不纏足、接受體育教育、身體健康就成為民族振興的保證，是中國走入現代化的前提。五四前後，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念，譬如個人選擇、個人自由等等進一步成為知識份子批判中國文

文棣論述說，中國傳統文化規定了「女子無才便是德」。但在二十世紀初左右的中國，許多知識份子如康有為、梁啟超等都相信，中國婦女的生存狀態就是中國缺乏力量和落後的象徵。反之，婦女不纏足、接受體育教育就成為民族振興的保證。但這種對中國的想像，主要來源於一個中國可以在語言上、文化上平等參與的世界大同景象。

五四前後，女性的身體一直是中國知識份子試圖重新想像和設計國家民族形象的主要議題，女性的身體不停被賦予各種各樣的意義。然而，謝冰瑩、盧隱、凌叔華、冰心等女作家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其身體形象大都是非死即病，一副凋零景象，與熱熱鬧鬧的民族主義夢想的身體強壯、精力旺盛的新女性相差甚遠。

化的參數，西方的家庭價值原則則成了批判中國傳統家庭的標準。婦女問題的討論進一步深入。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中反對將拯救民族的責任全歸在婦女身體（節烈）上的這種理論。胡適在〈貞操問題〉中強調個人權力的重要性。葉聖陶在〈女子人格問題〉一文中建議，應該建立女性的「人格」，女性不應再被其他關係諸如妻、母、女等所定義，而應是一個獨立的個人。他同時還提出，不應把女性的生育看成是為男人的傳宗接代，而應把生育看成是為現代社會所作的貢獻。這樣，女性的身體不再屬於家庭宗族，而屬於現代的國家。可以說，女性的身體一直是中國知識份子在面臨西方壓力下試圖重新想像和設計國家民族形象的主要議題，女性的身體不停地被賦予各種各樣的意義。文棣指出，這種對女性身體的強調又一次不經意地重複了中國傳統女德對女性身體實踐的要求。

新湧現的女作家是怎樣回應這種民族主義對女性身體的要求的呢？仔細地閱讀謝冰瑩、盧隱、凌叔華、冰心等女作家的作品，文棣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這些女作家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似乎沒有一個可以用她們的身體實現富國強民的理想。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身體形象，大都是非死即病，一副凋零景象，與熱熱鬧鬧的民族主義夢想的身體強壯、精力旺盛的新女性相差甚遠。

由於20、30年代作品的主題大都與「自由戀愛」有關，文棣從當時熱烈地討論的戀愛與婚姻、性與獨身主義等問題入手，考察女性主體和身體在這些作品中的意義。20、30年代的作品有一種明顯的渴望：

渴望一個在科學和愛情基礎上建立的理想社會。理想的愛情似乎是種在現行的社會和條件之外的「純粹」的愛。由於浪漫的愛和獨立的個體緊密聯繫在一起，愛情成了現代性的雙重指標：直接實現個人意義，間接促進現代國家的建立。女作家在這種新的愛的哲學覆蓋下，試圖在作品中確定這種愛情哲學對女性和她們生活的意義。有趣的是，她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總是猶豫不決、困惑不已。她既尋求也質疑愛的意義和價值，愛似乎是一個幻影、一個兩難境地——她必須既是一個堅強的、向民族目標前進的女性，同時又實現她的個人欲望。結果，她最終無法兩全，即無法實現愛，也無法實現愛的終極——對國家的責任。文棣以盧隱的小說《女人的心》，凌叔華的《繡枕》，陳衡哲的《洛綺思的問題》和冰心的《遺書》等作品為例，詳細地分析了女人的身體、愛情和國家的關係。她總結道：《女人的心》中的女主人公最終既不能和愛人也不能和前夫生活在一起，說明了新女性的無路可走。她無法和愛人在中國開始新的理想生活，因為傳統無處不在。她也無法回到過去，回到前夫身邊，因為過去的大門已經關上。只有當她的身體不存在了，問題才能解決。冰心的《遺書》是以死者寫給冰心的信的角度袒露她的一段愛情，此刻，這個女主人公身體已經不存在了。種種閱讀說明了現代女性的身體仍是「道德」操作的領地。雖然「德」的內容已經發生變化，但其形式結構並未變革，其本質仍是與傳統相接。

文棣指出，傳統的「德」與「才」的意識形態仍然改頭換面地操作在現代文學的構建中。女作家在新文

學中的位置一開始就被認定成了「女性的」位置，也就是身體和「德」的位置。女作家對寫作的態度也說明了這點。女作家在她們的作品中將女性和文學寫作性別化，寫作被賦予在男性的位置上。中國歷史上雖然有許多女詩人，但是，寫作本身歷來被看成是男性的活動。寫作不是女人的事。寫作會使一個女人拋頭露面，走出「閨閣」，跨越界限，進入女人不該進入的男性公眾領域。五四以來，現代女性和現代文學的結合產生了「女性文學」（當時也稱之為「女子文學」或「婦女文學」。文棣在其書的第45頁將這三個名詞列在一起，共同指稱「婦女寫作」。她的用法是指同一個概念。據文棣和白露[Tani Barlow]考察，五四早期，「女子文學」和「婦女文學」用得多一些，後來在30年代起，逐漸被「婦女文學」代替）。文棣指出這個概念是矛盾的結合體，其本身就意味着傳統和現代的糾纏，也暗示了婦女文學的困境。

文棣再次以冰心和盧隱的作品為例說明她的論點。文棣指出盧隱的《一個著作家》和冰心的《超人》都是以「寫作者」為主人公的。這兩個能寫作的主人公都是男性。他們為了寫作的神聖性，對現實都保持着一種冷淡、孤獨、傲慢的姿態，雖然他們寫的東西也許充滿了感情和對情感的懇求。兩篇小說中的女性——母親、姐妹、情人都顯得溫暖、慈愛，可以為主人公解脫孤獨。但是主人公必須與溫情鬥爭，以免成為普通人。在這兩篇作品中，文學和寫作成為抽象的、被壓抑的精神，感情和敏感，與之對立，婦女成了使感情和精神具體可親的力量。讓人驚異的是作品中暗含的寫作與性

別的對立。兩位女作家無法在她們早期的作品中構造女性寫作者的形像，她們把寫作者的特權位置賦予給男性，留給女性的是「婦女的位置」——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她們的作品似乎說明女性和文學不能在一起，因為文學屬於男性領域，如同「才」是屬於男性的一樣。

新女性文學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關注對女性主體性和女性心理狀態的探討，文棣認為此中意義不同尋常。因為這不是甚麼自我嬌縱的小事小情，而是女性在中國文化的歷史背景下，探索、跨越她們的「德」的位置的心理和物質邊界的努力。只有從這點出發，才能凸現20年代出現的「婦女文學」和女作家的意義。然而，女作家的作品很快就遭到新文學批評家的指責。文棣分析了20、30年代對婦女文學的討論，發現女作家開始發表作品不久，很多評論家就開始指責她們的作品，認為她們缺乏社會意識，太「女性氣」了。女作家的作品被指過度地抒情、憂鬱、主觀、情緒化，與時代不符。當時的批評界一方面對女性文學的出現拍手叫好，另一方面則對女作家的作品搖頭不滿。歡呼女性文學出現的學者評論家試圖證明，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從來就是屬於女性的，是以陰柔為美，以女性的特質為正宗的。比如謝無量1919年的著作《中國婦女文學史》力圖把婦女和文學結合，宣稱婦女不但創造了大量作品，而且，許多藝術形式也是婦女創造的。批評現代女作家作品的人，則把女作家的作品貶成保守的、自我中心的、與時代脫節的。在風起雲湧的「時代要求」的大聲批判的壓力下，女作家不知該如何是好，大部分作家只好

文棣分析了20、30年代對婦女文學的討論，發現女作家開始發表作品不久，很多評論家就開始指責她們的作品缺乏社會意識，太「女性氣」。批評界一方面對女性文學的出現拍手叫好，另一方面則對女作家的作品搖頭不滿。在風起雲湧的「時代要求」的大聲批判的壓力下，大部分女作家只好停止寫作。

夏麗的《母親與現代中國的敘事政治》是從母親的形象入手，解讀現代文學與民族主義，中國的現代性，男女兩性政治和現代文學發展的複雜關係。在五四早期的作品中，「母愛」和「愛的哲學」是最主要的主题。這個理想化的母親，實際上是構想中的中國現代性的中心形象。

停止寫作。到了30年代初，文學中的「德」的位置都不為女性存在了。只有丁玲試圖按照「時代要求」寫作，走上了從「愛情到革命」的道路。從此以後，女作家的位置被正統文學取消，革命的宏偉敘事只給作家留下一個位置：貌似無性別的，實則是男性的身份。文棣對大部分女作家在30年代突然擱筆作了很有說服力的闡述。

至於夏麗的《母親與現代中國的敘事政治》，閱讀討論的也是五四時期到30年代初的文學作品。她的角度是從母親的形象入手，解讀現代文學與民族主義，中國的現代性，男女兩性政治和現代文學發展的複雜關係。通過對母親形象的多重揭示，夏麗亦為現代女性文學一辯，指出被嘲諷已久的、滿含貶義的女性文學的「感傷」，實則是男性劃分給女性文學的位置，其實男性作家的作品也充滿了感傷情調，但文學批評對男性作家的「感傷」給予充分理解，經常將之描述為這些作家的「早期階段」，對女性作家的感傷特點則一概定義為女性文學的本質而予以排斥。夏麗進一步揭示男性敘述，特別是茅盾的小說和以他為代表的文學批評，實際上盜用了女性文學的位置和身份，扼殺了蓬勃興起的女性文學。夏麗顯然也是在為女性文學正名，以恢復現代女性文學的歷史面目。她的努力和文棣的努力異曲同工，都顯示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重新評價歷史，書寫歷史的鋒向。

《母親與現代中國的敘事政治》共有七章，實際上是從七個角度分析「母親」形象在現代文學中的表現。夏麗從五四早期作品中比比皆是理想化的母親形象入手，指出

「母親」在2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是中國現代性的重要形象代表，她代表的不僅僅是母親，而是現代知識份子想像的、在理想社會中新的人際關係。五四時期，特別是葉聖陶和冰心的作品裏，「母愛」和「愛的哲學」是最主要的主题。這個主题也充滿在各種各樣的報刊頁面上，風行一時。在這些作品中，「母親」都是一個溫柔、充滿愛心、自我犧牲的形象。為甚麼這種理想化的母親形象突然成為文學的想像的熱點？夏麗論證道，這個理想化的母親實際上是構想中的中國現代性的中心形象。五四時代的知識份子在描繪想像中的現代中國的藍圖時，把「母親」設計成真誠的人性關係的代表。這種真誠的關係又是以母愛為表現的——因為母愛是「自然」的愛。在他們看來，「自然的愛」與中國傳統社會人為的、虛假的人倫關係格格不入。由於他們要砸碎和摒棄中國傳統的人倫關係，「母親和她所代表的愛」就成為想像的另一端，成為現代社會基礎的象徵。同時，「母親」形象又與當時對「婦女問題」的討論聯繫在一起。五四時期知識份子以「婦女」為度量衡，丈量他們對傳統的反抗。他們認為，婦女解放是他們自己從垂死的父權下解放的先決條件，似乎婦女一解放，知識份子也就從傳統中解放出來了。「婦女」成為雙重工具：被壓迫和犧牲的婦女成為批判傳統的最順手的形象，同時，創造出來的新女性又成了中國未來的象徵。在這種對現代國家民族的想像中，婦女成了槓桿，挑起中國存亡的重任。

由於當時的知識份子普遍受達爾文進化論影響，他們對男女的「自

然性」也深信不疑。母愛被看成是最自然的愛，是未來「自然而正常」的社會的基礎。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母親的形象就這樣被賦予了特殊的使命：她是種族進化和社會進步的化身，她的愛為創建有「人格」的人和現代社會人際關係奠定了基礎，她將正確地撫育未來中國民族的建設者。冰心和葉聖陶兩人都是回應了那個時代的號召，在他們的作品中傳達了那個時代的「母愛」旋律。然而，自20年代末以來，葉聖陶表現母愛的作品被稱為早期之作，被看成是他成為現代中國主要作家的必經階段。冰心的運氣就沒那麼好。冰心的出現曾受到熱烈歡迎，因為她迴響了「母愛」的時代號召，但是隨着新文學向「現實主義」靠攏，冰心漸漸地被移出正宗文學的主流，被蓋以無關重要的「愛的哲學」的戳印，驅入文學史的邊緣。

夏麗認為，五四文學革命的話語建設過程，就好像是「現代兒子」對「傳統父親」的反叛，其特點是對「母親」的迷戀，對從壓迫的家族關係中解放婦女的強烈呼喚。在這樣的「家庭」革命中，首先應該獲得解放的是甚麼樣的婦女呢？夏麗指出，現代中國文學產生了史無前例的「俄底普斯」故事，陳白塵的《報仇》、盧隱的《父親》、茅盾的《動搖》、曹禺的《雷雨》等，均以兒子愛上庶母的故事為情節。一個年輕的現代青年，愛上了專制、年老的父親的「性」佔有物——父的妾，他的「母」。這種被禁止的愛情——從父權的手中奪到父權的女人——表面上似乎是在抨擊傳統中國的父權制，實際上，仔細閱讀這些作品便可以看到，沒有一個「母」在這些作品中獲得「解

放」。女性在這場「子與父」的鬥爭中，只是兩位男人的戰利品。

據說魯迅小時候特別對「目蓮救母」的戲着迷。目蓮之母在地獄中受煎熬，目蓮想方設法營救。魯迅成年以後，這個故事仍然活躍於他的記憶中。夏麗以此為寓言闡述到，如果母親是祖國的話，那麼五四時代的知識份子相信他們是在救中國這位「母親」。但是，以救母為己任的民族建設者，在文學作品中很少產生母親拯救者的形象；相反，很多作品表現出一個被動的、感傷的、政治上無能的、在母親面前卑怯的兒子形象。夏麗論證說，面對西方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所處的位置實際上是「非雄性化」的。民族主義在面對祖國母親時應是「英雄」的形象，但是，面對西方他又是「非雄」的身份，母親拯救者的無力無能實際上是這種身份的表現。面對西方，中國喪失了「雄」氣，感到懦弱無能；面對「母親」，這個素來被尊崇的形象，也失去了拯救的力量。郁達夫的小說體現了這個特點。在他的小說《血淚》、《在寒風裏》和《沉淪》中，母親無一例外地是讓人沮喪的、統治一切的形象。她們對兒子們不能為家庭帶來榮華富貴感到羞愧難當。她們的羞愧使兒子的「男人之氣」大受打擊。郁達夫的作品裏瀰漫着征服女人、拯救女人和用力量懲罰女人的願望。實際上，郁達夫的位置是與祖先、父親、菲勒斯認同。魯迅的小說同樣也用「母親」的形象探討中國的「陽剛之氣」的危機，並把這種危機與民族的無力相連。他的《補天》、《奔月》、《在酒樓上》等作品都沒有「救出」「母親」。

夏麗認為，五四文學革命的話語建設過程，就好像是「現代兒子」對「傳統父親」的反叛，其特點是對「母親」的迷戀。如果母親是祖國的話，那麼五四時代的知識份子相信他們是在救中國這位「母親」。但是，卑怯的兒子形象，體現了喪失了「雄」氣的中國感到懦弱無能，也失去了拯救母親的力量。

夏麗細讀了茅盾的「新女性小說」，發現他的作品其實化用或盜用了女性作家作品的情節和結構。茅盾一方面批評女作家的狹窄、感傷、幻想，用他的「批判現實主義理論」裁量她們的作品；另一方面卻挪用他所批評斥責的情節結構。這種以男性身份佔據女性氣質的位置，實際上剝奪了「女作家的女性氣寫作」的位置。

出人意料的，女作家作品的「母親」與男作家的很不相同。夏麗在女作家的作品中發現「母親」的缺席狀態。現代女作家的作品充斥着喪母的恐懼和痛苦。夏麗以盧隱和馮沅君的作品為例論證說，這兩位女作家在探索新女性的「無母狀態」中暴露了理想化的母愛的話語的性別不平等。夏麗還細讀了茅盾的「新女性小說」，揭示這位被譽為善寫新女性形象的「傑出」作家，他的作品其實是從女性作家作品的情節和結構中化用或盜用而來的。茅盾一方面著文批評女作家的狹窄、感傷、幻想，用他的「批判現實主義理論」裁量女作家的作品；另一方面，他挪用他所批評斥責的情節結構，比如，《幻滅》中「缺母結構」等等寫作新女性形象。許多評論都指出茅盾作品具有「女性氣質」，這種以男性身份佔據女性氣質的位置，實際上剝奪了「女作家的女性氣寫作」的位置。在茅盾的批判和挪用面前，女作家似乎無路可尋可走。

《母親與現代中國的敘事政治》就這樣以分析母親形象入手，切入對中國現代性、革命、婦女等話語討論，從一個角度敘述了一段不被注意、但極為重要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發展史。夏麗堅持「逾越邊界」的閱讀策略。理論上她綜合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多種當代文化理論來解釋具體作品；在作品的選擇上，她選擇了經典性和非經典性的諸多文學樣式，並堅持在諸多的作品中發現「表現的類型」，進而考察這些類型和產生它們的性別意識形態、階級及民族的關係。她的閱讀既具文學性也具歷史性，對文學與歷史的分析闡述貫穿於各章節之中。由於獨到的角度和批評方法，

她的分析常常能有令人對熟以為常的作品刮目相看的效果。

把文棣的《現代中國的婦女與寫作》和夏麗的《母親與現代中國的敘事政治》放在一起閱讀，可以清楚看到，雖然兩部書的分析角度和理論策略不一樣，但兩者的女性主義立場、對「正統」中國文學史的顛覆性寫作都清晰可見。兩位學者都堅持從文學史的「邊緣」出發，把一直受到忽視的女性文學作為論述中心，以此考察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來龍去脈，修改和重新定義了現代中國文學史。顛覆邊緣和中心的政治關係是女性主義的文化政治策略之一，兩本書以此為任，並作出了貢獻。作者運用當代西方的種種文化理論，但堅持對中國的文化研究作具體的歷史、政治分析，而拒絕以西方理論直接解釋中國文學。文棣堅持把現代中國文學放到中國傳統文化內閱讀，探討傳統和現代的關係。對現代文學作品，她們堅持「非字面」閱讀，也就是說，不僅僅是發現某部作品說了甚麼，而主要是揭示某部作品是被怎樣的意識形態和藝術策略製造出來的。她們對作品的「穿透」往往提供了新的閱讀可能性。另外，她們對自己的閱讀立場都具有清醒的反思。由於清醒地意識到沒有「非政治」的閱讀，她們努力對自己的性別政治立場、種族立場和學術位置進行界定和反思，明確自己作為批評的主體的「權力」和局限。

我想，這些「她者」的眼光，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考、認識現代中國文學的角度。

沈 睿 美國奧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 比較文學博士候選人